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战略部署,明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这为文化建设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江西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军队的摇篮和共和国的摇篮,红色文化遗产丰厚,精神谱系光辉独特,肩负着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的重大使命。近年来,江西充分依托红土圣地的独特优势,以治理现代化为有力牵引,把制度完善、科技赋能、协同联动全面融入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流程,稳步构建起内涵丰富、载体多元、传承高效的精神标识体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政治站位,运用更具系统性的治理手段、更具创新性的思维方式,进一步深化红色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以及精神标识体系建设。这不仅是守护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重大政治责任,更是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的必然要求。

深化系统保护, 筑牢红色基因传承的治理根基

“系统性保护”核心要义在于充分运用系统观念与法治思维,全力构建起覆盖全域范围、具备协同高效特质、提供有力保障支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构建全域协同、科学规范的法治化保护格局。保护是传承的基石。江西省始终秉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推动文物保护工作从点状分散向系统集成全面升级。一方面,充分强化规划与法治的引领性作用。在《江西省建设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规划(2024—2028年)》等框架的有力指引下,江西积极主动探索跨行政区域的协同保护机制,针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核心区、中央苏区核心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开展全面的整体规划与系统性的连片保护工作,切实保障革命文物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的展现。另一方面,着力健全分级分类保护机制,积极推动保护要求深度融入国土上空间规划,科学划定保护红线。同时,将红色文化传承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明确财政投入刚性要求,有力推动遗产保护工作从被动抢救模式向主动预防模式转变,为红色文化遗产构筑坚实可靠的法治屏障。

强化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的创新性保护手段。江西省积极响应“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国家战略部署,坚定不移地将现代科技深度融入文物保护的全流程、各环节。通过运用三维扫描、虚拟重建、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数字化技术,对珍贵革命文物、重大遗址开展全方位、系统性的信息采集工作,建立高精度数字档案,切实达成文物的永久保存与云端共享目标。这一系列重要举措,不仅为文物本体保护提供了数字孪生的精准监测与高效修复支撑,更为后续文物的活化利用筑牢了坚实基础,促使文化遗产突破时空局限,焕发出鲜活的数字生命力,有力推动了文物保护成效有形化与文化传承效能最优化的有机统一。

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保护机制。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江西省始终坚定不移地持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这一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工作格局。一是切实强化各级政府的主体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二是积极引导并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及民间力量,通过捐赠、志愿服务、技术合作等形式踊跃参与,从而形成多方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红色根脉的良好氛围与长效机制。

创新活化利用, 激发红色精神标识的时代价值

保护之目的在于传承,传承之关键在于活化。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推动红色文化由历史资源转化为鲜活的当代精神标识。

深化价值挖掘,构建植根本土、贯通古今的精神谱系。江西省致力于对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进行与时俱进的深入阐释,不仅要精准明晰其历史脉络,更要透彻阐释其当代价值。通过整合党校、高校、党史研究部门等多方力量,精心设立专项研究课题,持续产出具有深刻思想内涵、重要价值意义的理论成果,为精神标识的精准提炼提供坚实有力的学理支撑。

创新表达方式,打造可感知、可传播的标识产品。江西省积极推动红色文化表达方式的现代化转型。在文艺创作领域深耕细作,打造出《长征第一渡》等文旅史诗作品与《长征先锋》系列动画等精品内容,为崇高精神赋予更具感染力的艺术呈现;在体验场景拓展方面,运用VR/AR、全息影像等技术,于革命旧址、纪念馆开发沉浸式、交互式的研究课程与参观项目,让历史真正“活”在当下;在国民教育融合层面,将红色场馆、革命故事纳入“大思政课”体系,推动史料转化为教材、现场转变为课堂,切实实现培根铸魂的育人目标。

推动融合赋能,释放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综合效益。江西省将红色资源活化利用与区域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一方面,深化“红色+旅游”融合发展,通过推出主题游径、建设经典景区、提升服务品质等举措,着力打造多元“红色+”融合业态;另一方面,扎实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实施九项融合措施,并发布10条红色研学精品线路。同时,积极推动“红色+乡村振兴”融合,支持革命老区依托红色资源培育特色产业,让发展成果切实惠及老区人民,实现社会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完善制度保障, 凝聚赓续红色血脉的磅礴合力

推动红色基因传承事业持续稳定、健康有序发展,要依靠科学完备、运行高效且切实可行的制度体系。

加强统筹协调与组织领导机制。江西省坚定不移地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切实将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之中。积极建立并持续完善跨宣传、文旅、发改、财政、教育等部门的常态化联席会议机制,全面统筹解决规划衔接、政策配套、项目落地等关键协同问题,进而凝聚起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强大工作合力。

优化多元投入与长效保障机制。在持续有力加大各级财政投入与保障力度的同时,江西省积极激活市场与社会活力,主动探索多元化资金筹措渠道。通过设立红色文化发展基金、积极推广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全面落实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等政策举措,切实引导并激励社会资金参与红色资源的保护性利用和创意性开发。与此同时,着重强化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的绩效管理、监督审计工作,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夯实人才队伍与智力支撑机制。事业之兴衰成败,关键在于人才。江西省积极着力编制并实施红色文化人才专项规划,通过采取项目资助、研修培训、职称评聘倾斜等综合性激励举措,精准培育与引进在研究阐释、保护修复、创意设计等领域的高精尖专业人才和领军人物。尤为注重培养扎根基层的“红色工匠”与青年后备力量,为红色基因的永续传承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与专业保障。

江西作为一片具有深厚红色底蕴的沃土,承担着特殊且光荣的使命。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引领,主动将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和精神标识构建,融入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持续深化系统性保护,实现创新性转化突破,完善现代化治理,让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的实践中绽放崭新的时代光彩。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

本版责编:续红明 李端 严小稚

革命文物

中国共产党早期省委机关的见证

——记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旧址

钱炳彭



毛泽东杨开慧故居 堂屋



清水塘石碑



毛泽东杨开慧故居 西边前房



《湘区丰碑》专题陈列展

连接,合围成一个小院落,占地面积179平方米,建筑面积112平方米。整个建筑共有堂屋、主卧室、客房等大小房屋9间,现均按原状布置陈列。

前院中间进门为堂屋,四扇花格木门组成堂屋前墙,室内靠后墙置红漆方桌一张,悬挂着毛泽东1924年的照片。

堂屋两边为正房,东前房是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的住房,房内陈列着红漆架式雕花大床、书桌及文具、藤编书架,书架上方墙上挂着杨开慧和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合影。西边前房是经常招待革命同志的客房,供党内其他人员临时住宿。东后房则是向振熙卧室,1921年秋至1924年5月,向振熙老人在此居住,帮助杨开慧照料小孩、操持家务,支持毛泽东工作。左手边则是会议室,毛泽东于1921年冬至1923年4月、1923年9月至12月居住清水塘期间,经常在这里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研究工作。

据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馆长罗业永介绍,旧址的保护工作始于1951年,当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购了这栋房子,将其作为永久性革命旧址进行保护和管理,并进行了加固维修。1952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拨款修缮,同年10月,旧址作为长沙市第一个革命纪念地正式对外开放。1956

年,旧址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9年,在旧址东侧修建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陈列馆,并扩建了毛泽东塑像广场,这些扩建部分构成了今天旧址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旧址被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3年旧址冠名“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暨毛泽东杨开慧故居”。2006年6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罗业永介绍,近年来,随着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的全面建设,旧址的保护进入了科学化、系统化的新阶段,加强安防消防设施建设,规范物业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对建筑本体的监测、日常维护和定期保养都已形成制度化的管理体系。同时,通过购买、捐赠等方式,大力征集与旧址息息相关的珍贵藏品70余件(套),丰富了旧址内展陈内容,初步形成颇具特色的藏品体系。目前,旧址和院内的陈列馆、主席塑像、清水塘等均已成为地方党史的重要展示平台,也是中共长沙历史研究和宣传的重点阵地。

2025年,旧居和陈列馆共开放服务310天,累计接待观众125万余人次、1.27万余批次。2026年,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将在春节、国际博物馆日等开展讲党课、研学、非遗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红色场馆搜集文物线索的经验和方法

任相原 彭宇



塾塘庙戏台功德碑(道光甲辰年)

在陈列展览中,部分红色场馆常需要征集、复制或仿制一批文物来解决可展文物不足的问题,一般以照片、文字版等方式处理。在此情况下,若能掌握搜集文物线索的一些方法,无疑将会方便征集、复制或仿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搜索“全国珍贵文物数据库”

“全国珍贵文物数据库”是国家文物局联合全国上千家文物收藏单位建设的国有一、二、三级文物信息数据库,登记有文物名称、类别、年代、收藏单位等信息,共计2354408条,是搜索近现代革命文物线索的重要电子数据库。在浏览器搜索“国家文物局综合行政管理平台”,随后进入“公共服务”页面,点击“信息咨询服务”功能的“博物馆和馆藏文物”即可看到“全国珍贵文物数据库”。在该数据库的搜索栏中输入涉及某一革命历史人物、事件、活动等的关键词或相关场馆名称,便会出现相应的文物信息。

通过历史著作、史料汇编等书籍的标注和说明查找

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任何文物皆为史料,并承载着一定的历史信息。当然,也可以说,有些史料是文物。而从有些史料是文物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如何搜集文物线索呢?那就是查找相关历史著作、史料汇编等书籍的标注或前言、后记等说明。规范性的历史著作和史料汇编会严格标注和说明所引用或编排的史料来源。据此,便可顺藤摸瓜,查找相关史料(文物)的具体出处。例如,《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编(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7—1927.1),收录有《团上海地委给团中央的信——同意中央关于以任弼时、张伯简、俞秀松为区委员的决议》(1924年10月5日)和《团上海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关于补选任弼时、张伯简、俞秀松为委员及委员会的分工》(1924年10月6日)两份文件。从“编辑说明”可知,这两份文件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通过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布的可移革命文物名录查找

2018年,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关于报送革命文物

名录的通知》。通知印发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分批次在相关网站上公布了本地可移动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例如:河北、福建、湖南、北京等在省(直辖市)文物局的官网公布,湖北、贵州在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官网公布。每一批次公布的革命文物名录都登记有文物名称、行政区域、收藏单位、级别(一级、二级、三级、一般)、数量(件/套)等信息。只需在相应的网站下载各批次革命文物名录文件,便可一览。既可以通过关键词查找,也可以逐项查找。具体采用哪种方法,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线下和线上多留意其他单位显露的文物线索

红色场馆的工作人员因学习、参观、交流等多有机会前往其他场馆,在此过程中,便要留意其他场馆是否有自身所在场馆需要的文物。

有些纪念馆、档案馆、文物局等单位会在其官网公布部分文物藏品信息或者发布涉及相关文物的新闻报道。这需要平时多留心,虽然颇费时间,但可能发现价值大、关联度高的文物线索。

有些期刊、报纸也会刊载文物信息。如《党的文献》《百年潮》等期刊会刊登、披露一些一手史料(文物)内容。例如:2005年,《百年潮》披露了一位美国民间收藏者保存的档案——《1926年2月2日,任弼时致加拉罕的信》(手写信),内容为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向青年共产国际求助经费事宜。

与相关单位及红色收藏家加强交流合作

正如前述,有些史料也是文物,而档案又是属于史料的一种。笔者在与其他纪念馆、档案馆、党史研究室交流的过程中,发现有些珍贵档案(文物)是不公开的,只在内部交流,因此,鲜有人可以接触到。这些珍贵档案(文物)的资源也值得挖掘。例如,中共湘潭县委党史研究室曾赠送给任弼时纪念馆一本内部资料《罗亦农生平史料汇编》,其中有一些档案涉及任弼时,如照片“旅俄同学合影留念”,“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录取名单”。

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合作。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对于研究者来说,掌握一份有价值的新史料,往往能言他人之未言,形成新的研究视角。一些科研机构的研究者往往会在搜集相关史料上倾注全力而有较多收获。例如:2023年,任弼时纪念馆与上海某高校教授合作,从俄罗斯的3家档案馆扫描关于任弼时的资料(档案、期刊、报纸、书信、照片等)约80件,其500余页。

同样不能忽视同民间红色革命文物收藏家的交流合作。这些收藏家都收藏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文物(原件),并且有一定的“关系网”。例如,2023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部分文章便是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从“坊间发现并收集到的有价值的档案资料”。

围绕历史发生地开展实地调研

搜集文物线索还可以前往与某一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相关的区域实地调研。通过查找文献资料、访谈等方式确定涉及某一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的区域后便可以开展实地调研,可能会有新发现、新收获。例如,据任弼时的叔父任理卿回忆,五四运动期间的任弼时曾在家乡塾塘庙、桃花洞、白鹤洞、阎塘庙等地讲演,到公共场所演剧。根据资料记载,笔者便在任弼时曾活动的村庄里走访当地老人,最终找到塾塘庙旧址。经先后三次到该旧址调研,共找到4块残存的功德碑。这4块碑曾嵌于戏台上,五四运动期间任弼时曾在戏台上讲演。任弼时纪念馆正缺少涉及其参加五四运动这一历史背景的实物资料,4块残存的功德碑因而彰显了独特的价值。

(作者单位:任弼时纪念馆)